

# 刘伟：超常规经济扶持政策转向要谨慎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中国经济成功实现V型反转，但复苏仍在路上，经济尚未完全驶入正常轨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复苏距离正常化增长轨道仍有距离：服务业生产尚在恢复之中；投资复苏的内动力并不稳固；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性过高；消费复苏缓慢；各类物价指数持续低迷，通货紧缩风险犹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不稳固。

“以上问题总体上看，突出的特点在于需求侧的修复滞后于供给侧，而需求侧中消费需求的修复滞

后于投资需求，在消费需求中，服务性消费需求，特别是一般传统服务性消费需求的修复滞后于一般消费品需求。”对此，刘伟表示，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依然来自超常规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等特点。因此近期应该保持政策定力，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随时准备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经济稳定复苏。

刘伟特别提示，近期不宜过早设立超常规积极财政政策向常规性积极财政转变的时间表，财政赤字率的调整、特别国债的退出、专项债

规模的适度下调、对于特殊行业中小企业补贴的退减、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的调整等政策措施变化都应该谨慎、尽量维持政策连续性。

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去年年初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基础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明显提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流量增速显著高于往年。货币政策虽然在去年3季度开始做出边际调整，但总体看我国当前的复苏路径还需要政策支持。未来政策取向和力度都需要保持稳定。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于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积极性问题需要继续保持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激励问题。如何使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居民消费信心、社会投资空间进一步提升，依然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刘伟说。

刘伟建议，要把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加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措施，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 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在谈及2021年中国经济趋势时表示，要迈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一步，首先要对新发展格局精确定义、准确把握。

高培勇列举了两种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偏差：一是把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二是以“畅通”来归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培勇认为，如果把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会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还可能模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着力点；另一方面，实现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之一，但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比“畅通”更深层次的考量。

“只有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层面来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找准着力点和着重点。”高培勇强调，相对于以往经济视域宏观调控操作层面

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站在全局高度和战略层面做出的重大决策，要着眼于应对外部环境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挑战而实施操作，需跃升至全局高度、战略层面，着手对整个发展格局进行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调整。根本原因在于量变引起了质变，唯有通过对我国发展格局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立足国内，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可能保证我们的经济稳步运行。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同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直接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外部环境由量变演化为质变的产物。随着安全对发展的意义凸显、分量加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

谈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高培勇表示，从整体上讲，宏观经济政策不急转弯的前提是要转

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保持它的可持续性。货币政策强调“稳”字当头、合理适度，它的重心应该是“稳”字。因而，对于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给予适当的或者恰当的、全面的阐释，既要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兼容高水平安全的目标。

高培勇就此提出，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对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说明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什么，是奔着什么而去的，同时也要看到，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两个方面都要做充分分析。二是要对症下药，区分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区分战时状态和日常状态的宏观调控操作不同点，而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操作。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不留或少留后遗症。

## 陈荫山：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0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持续居世界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陈荫山表示，2020年我国粮食实现连续第17年丰收，这在历史上和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为脱贫攻坚、解决14亿人吃饭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世界消除饥饿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荫山给出这样一组数据：据测算，2018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成本比美国分别高48.4%、57.59%、122.94%、145.11%。中美粮食生产成本最大的差异在人工投入和地租。人工投入方面，中国占成本的30%，美国不到10%，我们主要是规模小、机械化水平有差距。地租方面，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分别高出美国42.94%、24.05%、78.41%、143.87%。

在陈荫山看来，我国粮食生产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如，农业科技装备支撑能力

薄弱。当前基层农技推广仍十分薄弱，严重影响了技术的推广应用；粮食大县、财政穷县，地方抓粮积极性不高。“去年我们调研的10个产粮大县，粮食总产量超过1300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2%，财政收入却仅有150多亿元，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粮食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持续走低。东南沿海粮食主销省份粮食面积下降过大，粮食规模种植、粮食单产水平、粮食机械化耕作水平都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匹配。西部一些产销平衡省区把稳定粮食与脱贫攻坚对立起来。”陈荫山介绍说。

如何破解上述问题？陈荫山建议：一是研究制定新时期粮食发展改革方案。按照新理念、新格局的要求，向中央深改委提出新时期粮食发展改革方案，形成产得稳、储得好、调得动、供得上

的粮食保障机制，确保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二是推进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央政府向主产区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主销区向主产区补偿性转移支付的机制，加快补齐主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弱项。在充分发挥粮食主产区优势和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明晰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各自在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责任权利。

三是强化粮食生产主体政策支持保障。构筑农业补贴、信贷政策、保险政策“三位一体”的联动支持体系，为种粮农户构建收入保障网。

四是精准发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措施。进一步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大力推动国产农机装备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进一步增加粮食作物育种经费投入，强化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大力推动市场主导型的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公共服务推广功能，建立大学生服务粮食新主体的特岗行动计划。

## 做好经济领域的舆论引导工作

张小影

2020年，在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的极不寻常的辉煌，这对全社会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信心是个极大的提振，为我们驾驭今后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经济领域的舆论引导工作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信心指数，二是预期管理。同时，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舆论引导要把把握好正面宣传和负面意识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宣传好2020年来之不易的成绩，特别是剖析好成绩背后的原因，包括制度优势、体制机制的培育，乃至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从调研情况看，就业有三大难点，一是今年大

年年初开始，国内多个地方出现散发疫情反弹，社会上的忧虑和焦虑情绪有所抬升，有几个问题特别需要关注：

第一，就业问题。就业与居民收入以及消费增速密切相关，不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对完整内需体系的培育，乃至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从调研情况看，就业有三大难点，一是今年大

## 化危为机的发展成绩单与新起点展望

钟茂初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四季度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这一统计数据客观反映了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

其一，2020年一季度因疫情而导致负6.8%增长的严峻形势下，从第二季度起，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全年实现2.3%的经济增长。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到6.5%，这一增长率反映了当前国民经济恢复到了正常增长水平。与2019年6.1%的增长水平相比，基本持平。

其二，三次产业同步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2020年第四季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1%、6.8%、6.7%。与2019年第一产业3.1%，第二产业5.7%，第三产业6.9%相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已经超过了正常年份，第三产业略有下降。

其三，主要产业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部分产业的回复还有待时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物流业、房地产业、信息业已经超越正常年份的增长水平；金融业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等产业，距离恢复到正常年份增长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总体来看，这一经济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展望2021年的经济发展态势，短期视角看，统筹疫情防控和

学生就业很容易出现三类群体叠加，即国内2020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有完全就业，而2021年应届毕业生数量不小，还有海外回国的毕业生，三类群体同时进入就业市场，压力很大。二是受疫情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难度也不小，从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同比有所下降。三是疫情的反复对服务业打击较大，使服务业难以充分就业。

第二，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调研的情况看，不少企业尚未真正走出困境，建议扶持政策退出不能过急，特别是目前仍然需要更大力度减税降费，同时继续完善中央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形成常态化的制度性安排。

第三，营商环境问题。政务服务的改革，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不少企业反映，政策虽然不少，但具体执行的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要更多地听取企业的意见，使政策能够更加符合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政策下达以后，要多做详细的解读，使政策能够在更大范围当中得到传播和运用。政策执行以后，要及时督查和评估，使决策部门能够及时、全面、真实地掌握效果，并且进行调整和完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 李稻葵：畅通国内大循环 开拓国际新空间

本报记者 崔吕萍

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培育和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提出了3条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推动经济地理再布局，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当前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仅为美国的1/5，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需求有待释放。“从历史视角看，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的变化相当于历史上1500年的变化，而目前中国经济地理人口的变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本身的变化。今天的中国社会，突破了古代交通、语言、信息、文化、法律的限制。因此，人口流动与历史上的1500年相比，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动能。因此，我们应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解决制度性障碍，推动经济地理的再布局，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中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我们的测算表明，在人口结构大致不变的假设下，如果能用15年的时间，通过经济地理再布局，使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的人均GDP之比（不含直辖市）从2.6下降到1.57（美国当前收入差距水平），中国经济每年人均GDP增速将提高0.9%，这就是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重要新增长点。”对此，李稻葵这样表示。

第二，保经济安全底线，特别关注产业链、石油和金融三个领域。李稻葵表示，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特别是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政府很可能与其盟友在全球贸易政策上形成统一战线，制衡中国。中国应重视由此可能引发的经贸摩擦风险、能源供给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关于产业链安全。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推动产业在国内梯度转移；另一方面，应尊重市场规律，引导企业有序跨境布局。关于石油安全，建议国家加快石油储备机制改革，动用社会各界的力量，尽可能地多储备原油（包括成品油），特别是放开对商业石油储备的限制，形成政府与商业储备各占一半的储备结构，同时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中国长期石油安全提供保障。关于金融安全，建议做好三个方面：一，加快推动海外上市高质量公司回A股战略；二，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在推进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过程中要做到循序渐进、有节奏开放，掌握好开放的主动权；三，加强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监管，寻求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平衡。

第三，认真研究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原则。“我认为监管应遵循4个原则：一是应当以继续巩固并推动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全球领先地位为前提；二是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工作精准落实到具体领域和环节，切忌“一刀切”；三是以保护创新为重点，维护互联网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四是以保护线下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为底线，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民的美好生活。”李稻葵这样说。

## 发挥政策作用稳定早稻生产

刘木华

2020年，为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发展，国家提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政策措施。有关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克服洪涝灾害等影响抓好早稻生产，使早稻生产止降复升。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早稻产量2729万吨，比2019年增收102万吨，增幅达3.9%。实际上，早稻生产自2013年产量达3276万吨以后，一直逐年呈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到2627万吨，与2013年相比，降幅达到

19.8%。2020年早稻产量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止降复升。如，作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双季稻主产区江西省，2020年全省早稻种植面积达到1826.3万亩，比2019年增加约182.5万亩，增幅为11.1%；江西虽然受到洪涝灾害影响，严重降低了早稻单产水平，但早稻产量比2019年仍然增长了3.3%。

2020年早稻生产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早稻生产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早稻种植面临的自然风险居高不下，比如江西早稻受灾面积达到449.5万亩，许多粮农损失

惨重，颗粒无收；二是比较效益低下和成本增加双重因素严重影响了粮农种植积极性。如不出台支持措施，预计2021年早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有可能出现较大下降。为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持续早稻生产扶持政策，加大对早稻等生产主产区的转移支付、政策倾斜和资金奖励，提高对双季稻种植的补贴力度，确保地方政府能持续推动早稻生产。

二是早稻种植风险高，农业政策性保险虽一定程度能降低种植风险，但许多地区缺乏明确的保险定

损标准及细则，保险公司赔付的随意性大，赔付难以达到种植成本，农民保持种植的积极性大大受到挫伤。建议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尽快出台保险定损标准及赔付细则，设立一些特色险种，保证赔付额能达到种植成本。

三是加大基层农技人员培养力度，制定青年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措施，确保其晋升渠道、工资收入，制定以实际服务农业生产效果为考核目标的评价体系，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

## 国民经济正处在一种良性循环过程当中

莫天全

2020年，中国是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首次突破百万亿元人民币。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每个季度GDP增速都有较大改善，四季度增长甚至达到了6.5%，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此外，人均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我们距离中等收入水平又近了一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充分反映出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在增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人民币，比上年名义增长3.8%，这些可支配收入会直接转化成消费，反过来又可以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从这些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对于2021年的经济发展，也是很强的支撑力。

聚焦我所从事的房地产市场，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近期建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中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房

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应满足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确定的管理要求，即不得高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确定的相应上限。由于房地产市场所使用的资金量几乎占到金融市场的一半，那么房地产资金调节对金融防控风险的影响也应占到一半。说白了，房地产资金风险控制住了，金融的一半风险也就得到了控制。而如果防控不到位，导致这部分资金被挪用、甚至进入股市，则不仅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利，还会牵连与之密切关联的20余个行业。

面对未来，我认为：一方面，保障房地产资金充足，对相关行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而言都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过程越规范，开发商的信誉也将越来越高，生意会更加好做，但也要防止资金有倾向地向大企业集中，要保持市场长期健康平衡的发展。对个人购房者来说，购房时一定要不能过度借款，否则会导致个人消费压力剧增，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董事长)